

第六章 报国无门(1937-1942)

一、摒挡就道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袭击北平郊外的卢沟桥，中国军队奋起抗击，中华民族八年神圣的抗日战争从此揭幕。抗战爆发前，蒋介石正进行着以抗日为目标的政策调整，他在进行国共合作谈判的同时，对昔日的反对派也作出了和解姿态。1936年10月，陈铭枢还在欧洲时，就收到蒋光鼐的信，告诉他南京已在8月撤消了对他的通缉，并派人到香港转达请他回国之意。^[1]随后，陈即致电蒋，呼吁停止内战，抗敌图存。1937年5月，邵力子去菲律宾访问途中，专门到香港拜访了李济深与陈铭枢。邵对他们说，蒋介石已决定抗日，第二次国共合作大有可能，并代表蒋邀李、陈等回国参加政府。李济深、陈铭枢因不明底里，不便贸然入都，便派梅龚彬先去南京、上海了解情况。陈铭枢还写了一封信，让梅先去找林森和张群。梅龚彬还没有回港复命，“七·七抗战”爆发，蒋介石即打电报给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四人，请他们“克日来京，共赴国难”。蒋还派刘健群到香港，找何公敢转请李济深、陈铭枢等赴南京，共同抗日。

抗日是陈铭枢的夙愿，是自“一·二八”淞沪抗战以后他矢志以求的目标。现在抗日烽火已经燃起，陈铭枢更归心似箭，急切盼望为这场神圣的抗战尽自己一份力量。各方讯息传来之后，陈铭枢即开始做回国的准备。他先给在广西梧州老家的李济深去电，商量去南京一事，又给在南京的朋友去电，表明自己对抗战的态度，请予包容。

1937年9月3日，陈铭枢与蒋光鼐从香港过境，到达广州。时隔三年半，他又一次踏上了日思夜想的故土。在广州，陈铭枢与随后赶到的李济深一道同广东省主席吴铁城、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副总司令香翰屏等见面，老熟人相见，叙谈甚欢。吴对他说：“你现在可恢复与蒋先生过去的关系，这将大有助于国家。”陈铭枢听了很感动，但又一想恐怕没那么容易吧！就没有与吴深谈。^[2]在民族危亡的紧迫形势下，双方化解了过去的种种恩怨。余汉谋、香翰屏知道陈铭枢的经济一向不宽裕，还对陈有所馈赠。陈铭枢在与香翰屏的谈话中，告诫他，应整纪纲、肩大任、开放民众、不干涉民政。9月7日，陈铭枢等由从化飞至桂林，与李宗仁、黄旭初、李任仁等会见。9日飞长沙，与何键、张继等谈话。10日到汉口，当晚乘轮东下，于12日抵达阔别多年的南京，邵力子、黄绍竑等多名官员前往码头迎接。

第二天，陈铭枢循例谒中山陵后，即去会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随后与何应钦一起去见蒋介石，并共进午餐。蒋表示了彻底抗战的决心，陈则表示拥护蒋的抗战决心。初次恢复接触，未便深谈。下午，陈铭枢又会见了冯玉祥。晚上，孙科宴请陈铭枢，叶挺也在座。14日，陈铭枢又拜访了许多老朋友，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来访，介绍了八路军出动的近况和中共对抗战的主张。在和朋友们接触中，王造时、叶挺、王昆仑等向他谈起当局对民众抗日热情的种种限制，由于不能开放民众，军队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反而处处受敌人组织

的汉奸之害。这使陈铭枢对当局坚持防止异派发生作用的成见深感忧虑。但陈铭枢毕竟背离蒋介石已经多年，因此不想多说什么。他对拥蒋的老朋友段锡朋表示，只谈军事，不参加别种意见。

9月21日，蒋介石特任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为军事委员会参议官。蒋在召见蔡廷锴时特意表白：“你不可误会，以为参议官职是闲差。”^[3]实际上，闲差也罢，不是闲差也罢，双方心知肚明，但李、陈、蒋、蔡四人总算有了正式的名分（次年4月9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恢复李济深、陈铭枢的党籍），得以参加民族抗战的工作。

从8月13日起，中日双方主力，在淞沪一线发生大规模的会战。9月26日，陈铭枢即由南京去上海进行战地视察，在上海滞留了20多天，才回南京。对于陈铭枢的活动，国民党CC派大将吴开先曾对梅龚彬说，他得到许多密报，说陈铭枢正在活动，联络桂系，企图包围蒋先生。^[4]陈立夫对梅龚彬谈的就更直截了当，他要梅设法缓和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对蒋介石的不满情绪。梅龚彬谈了他们对抗日的建议，又说：“蒋委员长领导抗日，李济深和他的朋友们都拥护委员长抗日。大家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不会有什么不满情绪的。”^[5]后来，陈立夫又要梅龚彬劝陈铭枢等人多听蒋介石的话。在这种情况下，陈铭枢当然不能不出言谨慎。

为了表示团结抗战的诚意，陈铭枢回来后就主张解散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在同盟存在的两年中，虽然做了不少工作，但陈铭枢感到实行起来困难重重。一是同盟缺乏真正的群众基础，核心骨干星散各处；二是经济难以支持，原十九路军的公积金毕竟有限，又缺乏稳固的经济来源，有时采用大家出资的办法来解决困难。但陈铭枢的经济向来紧张，力不从心，遇有筹资之事，往往由蒋光鼐代陈出资，还用两份的名义，以提高陈的地位，但陈内心是窘迫的；三是同盟内部人事复杂，矛盾很多，第三党的彭泽湘对陈铭枢不满，专门挑拨他与李济深的关系，进行政治攻击。抗战开始后，陈铭枢感到同盟没有群众基础，组织软弱涣散，成了一块招牌，便主张结束同盟活动，拥护中央，一致抗战，共赴国难，也可以此减轻及消除当局对他们的疑虑，使当局能集中精力应付战局。陈铭枢知道，蒋介石对反对派组织甚为敏感，有人也向他转达过蒋要求解散同盟之意。

抗战爆发后，同盟对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已不作公开批评，曾声明全力拥护抗战，“拥护政府”，“专诚拥护”蒋介石的领导，但对是否解散同盟，内部则有不同意见。陈铭枢的意见是，抗战实现，同盟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主张解散。李济深对同盟内部意见分歧、工作进展不大也不满意，他曾说：“我对同盟并没有把它作为我个人活动的政治资本的意思，主要是国家民族已到了生死关头，同盟只是起着推动抗战的作用。只要全面战争发生了，同盟是随时可以解散的。”^[6]但此时李济深主张暂时保留，看看变化再说。由于陈铭枢在同盟内的地位和影响，许多人同意他的意见，认为“现在环境已改变，要求一致团结抗日之目的已达”。10月25日，同盟最高会议决定正式解散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并于30日发表《解散宣言》：“吾人深信此种光明表示，足以增强全民族团结之信念。我海内外同胞

组织一律结束后，所有力量，自当贡献政府，效力抗战，以贯彻吾人之素志。”^[7]

解散同盟一事，在当时和以后都引起不少人对陈铭枢的非议和批评。李济深批评他此举“等于自己解除武装”。在同盟内工作的地下党员梅羹彬也受到中共的批评，认为他没把工作做好。陈铭枢对时局发展的看法毕竟太天真了一些，虽然当时国民党也确实表现了一些新气象，他想从此全国可能会出现一致抗日的局面，但是，国民党抗战初期的一些积极做法很快就消失了，独裁的政治局面依然如故。同盟的解散使民主派失去了一个与国民党抗衡的有组织的阵地，客观上对国民党有利。

二、筹谋难用

陈铭枢回来以后，对如何在抗日战争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如何和蒋介石相处，一时还未考虑成熟。蒋介石为了抗战，也千方百计想用和平的手段消除反对派，以解除自己的后顾之忧。但他并不想开放政权，实现民主，只是想把各种政治势力纳入自己抗战的轨道。

陈铭枢去上海战场巡视回到南京后，蒋介石在10月22日专门约见了。蒋问他视察的印象如何，陈不便深谈，只谈了几点战术上的问题。陈对外交提出建议，认为政府应对外发表宣言，其作用为：1、使九国公约开会时不至随便提出调和停战，至陷我于大不利；2、坚我友邦（苏联）之信，易于加入作战，并使一些国家（英、美）着急，使共同对付日本；3、释全国人民的疑虑。蒋说：“这种意见当提出讨论。”蒋还问到陈的住处、生活如何，告诉他：“如果你需要什么，可以告诉慕尹（钱大钧）。以后你看到什么，可以随时来谈。”对他很是关怀。陈铭枢说：“我们因抗战主张已经实现，并早已声明取消团体作用，从纯洁的爱国出发来投效政府，所以我们这些朋友都是来听候政府驱策的。我的智虑短浅，不能有补于高明，不过愿委员长鉴察，我一向是愚直的。中间不幸虽乖背了多年，乃纯出于政见的不同，并非为私。今日朝野一致都汇合了，只有拥护委员长彻底抗日一途，再无政见分歧可说。所以今后对委员长，犹如过去一样愚直，望委员长也如过去对我一样。”蒋回答说：“是的。”临别时，陈对蒋说：“委员长时间极宝贵，恐不宜随时论陈，如我在分内见闻所及，准备用书面交慕尹转陈，但据事直书，不避忌讳的地方，请委员长涵盖。”蒋答：“可以的，可以的。”^[8]陈铭枢希望与蒋介石坦诚相见，修复原有的良好关系，从而能对抗战作出自己的贡献。蒋介石在战局紧张之际，极力加以笼络，表示出从善如流的胸怀，虽不无招纳异己的真心，但毕竟重在笼络，因而权术重于真情。陈铭枢一向轻信别人的承诺，在对蒋关系上也就不免再碰钉子。

蒋介石与陈铭枢见面后，分两次送给他10000元，让他安排生活，以示关怀。11月6日，蒋又约李济深和陈铭枢谈话。陈将自己写的意见当面交给蒋，并“陈说今后仍有继续进言之必要”。蒋对他们合作的诚意很是感动。言谈之间，蒋介石追忆往昔，态度诚恳，语言亲切，在国难当头之际，很动了些个人感情。他带着感叹的口吻说：“你们前在福建所做之事，反对我个人事小，但国家损失太大了！你们怎样反对我，我亦不至怀恨，当然我亦有不对的地方。实在我们在党国相处有这样长的关系，你们离开了我，不会做得成事，

我舍了你们，亦不能做得好。”陈也感慨唏嘘地说：“往事是不堪追悔了，我们此后只有尽心来做补过的王夫罢了。”^[9]

在此期间，陈铭枢和中共方面也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他在南京、上海先后和叶剑英、秦邦宪（博古）、潘汉年等进行详谈。不久，淞沪战局不利，蒋介石决定守南京，陈铭枢不以为然，曾向蒋有所陈说，但蒋意志甚坚。11月28日，陈铭枢撤到了汉口，住在新四军司令部。据传说，当时一度有让陈铭枢任新四军军长的动议。

12月间，陈铭枢在武汉经过仔细考虑，向蒋介石递交了长篇书面意见。这篇意见分为三部分，大意是：

一、关于抗战的建议。1、巩固领袖地位。闻北方伪政府成立，吴佩孚发出通电与中央，独不列蒋之名，此时拥护蒋尤觉必要。2、确定抗日联苏政策。组织纯粹民主集中而运用灵活的政权，令一切派系在一定纲领下活动；政府改组为战时军政府的性质，中心人物援用亲英、美、苏派，如宋子文、孙科、于右任、颜惠庆、陈友仁等。

二、关于对蒋的观感。1、好的方面：意志坚，魄力雄，负责任，精细勤苦，驾群伦之上。2、缺点方面：全凭主观；对部下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干涉权责，破坏牵制；以权谋术数取众，以之内争尚可收效，以之用于现代国家对外斗争则全属外行；临时应付，全无国策；偏听不确实及伪造的报告；无中心的集权。

三、关于自己安排的设想。1、如改造政府重心，愿列其中负责；2、出使前苏联；3、赴西北调和国共关系或归粤组织游击。^[10]

从陈铭枢这篇建议看，他确实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捐弃前嫌，共赴国难。他的建议不仅为了抗战，也为了蒋的个人地位，并无任何恶意。或许，蒋的几次亲切谈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对与蒋的关系和国家的前途寄予了很高的希望。陈的这一篇建议，确是忠谏直言。但忠言逆耳，除了巩固领袖地位一条，蒋自然爱听外，别的蒋概无反应，尤其是对蒋个人的批评，更难以为蒋所容忍。至于陈为自己未来安排提出的几条，不免增加蒋的疑忌，安排陈进中央政府固然为蒋所不愿，调和国共或使苏也有增强陈的地位的可能，归粤游击更有放虎归山之嫌，蒋一条也不会答应。说不定，正是陈的建议加深了蒋对他的成见，成为蒋在抗战期间疏远陈的原因之一。陈铭枢注定要为自己的天真与轻信而付出代价。

蒋介石对陈铭枢的建议未做任何正面答复。12月18日，蒋在武昌珞珈山官邸约见陈。陈铭枢对外交问题发展意见，认为应表示国际诚信，主要是对苏友好问题。蒋立即反驳说：“我们已有政策，国际不会不信。”“我们自然站在英、美、法、苏路线方面，惟目前苏联帮助我们的物资反不如德国之多，岂有必须拒绝德国援助，才可以取信苏联吗？”当时，蒋正在请德国的陶德曼在中日之间调停，陈铭枢深感蒋有关门之意，就不便再争论了。在内政问题上，蒋仍固执一向成见，并不止一次地抱怨中共不听话，不接受中央委派的人员。陈铭枢只好表示：“委座威严太峻，使我不能自畅其辞。”蒋说：“你可用书面写来。”但对

中共问题，陈铭枢仍表示：“如果需要我居中说话，我愿努力。”蒋介石表示同意。^[11]自此，陈铭枢对蒋深感失望，认为自己口头、书面意见蒋都不接受，一味文过饰非，成见比以前更深，思想比以前更狭隘，因此他也无心再进言了。此后，陈在武汉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与蒋没有接触，仅偶尔在公众场合碰面交谈几句。其间，陈铭枢还上过几次书，但都没有下文。

陈铭枢在向蒋的建议中，以调停中共自任，因而这段时间，他同中共人士往来甚密。据他自己抄录的日记片断记载：12月6日，访剑英；10日，剑英来访；19日，访剑英，适周恩来、王明自延安（来）；20日，再访王明、周恩来，谈对蒋公进言的商榷；22日，王明、恩来、博古来访；25日，宴周、王、董、叶、张云逸、邓颖超、孟……31日，张云逸来访。进入1938年之后，仍有几次重要的谈话。如，元旦那天，约王明、恩来谈。2日，恩来谈民运之重点。2月11日，与恩来谈国共两党问题。其中分析蒋介石的意图“终欲把各党派汇合于一个政党是也”。3月12日，周恩来自延安回，谈党派问题。3月26日，与王明谈国共摩擦事。

5月间，陈铭枢乘水上飞机到重庆，在四川游历。到江津拜访了他的佛学老师欧阳竟无，并由成都往青城、峨嵋等名胜游览。回到武汉后，6月5日，陈铭枢与蒋介石见过一面。陈谈到在川、在鄂的见闻，谈到区保长扰民、害民的情况，谈到国家总动员和统制外汇问题，蒋都不置一辞。蒋问陈对军事上的看法，陈批评了徐州会战战略上的失误，批评了作战保密性不够，尤其提出“军队长官对于战斗人员及枪械报告数字的不实在。如对军政部，因为要领饷，则以少报多。对军令部，因为怕打仗，则以多报少。应该迅速普遍点验，综核名实，以杜欺蒙的积弊。”蒋也没有作何表示。此次谈话时间不长，而且是蒋、陈之间在抗战期间、可能也是他们关系史上最后一次认真的谈话。此后，陈铭枢对蒋介石已经完全绝望，再也不愿作任何进言。8月17日，陈铭枢上书蒋介石称：“不愿陷入党派别斗争的漩涡，现决潜修学问，访教逸贤，兼究地方行政及各种制度。”^[12]书由陈立夫转蒋，次日陈铭枢即启程赴川。至此，陈铭枢由于蒋介石决策抗战而对蒋一度所抱之希望彻底破灭了。

三、宣传抗战

陈铭枢第二次旅欧时参加了国际反侵略运动，抗战爆发后，他在中国也积极参与组织领导国际反侵略活动和民间外交活动，为向世界宣传抗战，动员中国与世界人民支持抗战尽了自己一份力。

中国抗战爆发后，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在8月召开的第三次理事会上，通过援助中国决议案，呼吁各国会员督促本国政府援助中国，并号召各国民众团体，用经济方法抵制侵略者。与此相呼应，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于1938年1月23日在汉口举行成立大会。大会由陈铭枢主持，他首先报告了反侵略运动大会的成立经过及意义。接着于右任、邵力子、沈钧儒等先后致词。大会通过中国分会章程、宣言及各项提案，提案呼吁各国宣

布日本为公敌，抵制日货，援助中国，制裁日本。大会推举朱家骅、陈立夫、陈铭枢、周恩来、郭沫若、张冲、董必武等任分会理事。1月27日分会理事会由陈铭枢主持开会，推出邵力子、杭立武、周鲠生、邓飞黄、钱俊瑞等为常务理事，邵力子为主席，邓飞黄为秘书长。

中国分会成立后，为配合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从2月6日到12日，在武汉举行国际反侵略运动宣传周，在7天时间里，每天确定一个宣传主题，计有宗教、妇女、青年、工农、商人、难民与伤兵、文化等，逐日举行宣传大会及讲演活动。陈铭枢参加了多次大会，并做了演讲。2月11日的大会通过宣言，表示“我们不仅以抗战的呼声响应，且将以更坚决而英勇之抗战，以响应一切爱和平之友人。”^[13]

7月23日，为响应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反对轰炸不设防城市大会，中国分会在武汉召开大会，陈铭枢在会上演讲，要求以国际一致之行动，制裁侵略者，并表示“我们要以本身的努力，求得国际的援助”。^[14]

陈铭枢在武汉还担任了一个民间组织——国民外交协会的主席。他认为，为了争取国际援助中国，争取侵略国人民对被侵略国中国的同情和支持，需要大力加强国民外交工作，使各国内部产生一种援华的民众呼声与动力。为此，陈铭枢不辞辛劳撰文、演讲，向各国人民宣传中国抗战，使各国人民了解中国抗战。9月7日，陈铭枢以国民外交协会主席身份致电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要求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制止日本侵略，保卫世界和平。

1938年的武汉，是抗战的政治中心，政治气氛活跃。陈铭枢也频频在公众场合出面，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为抗战出力呐喊。他与中共和各界人士保持着密切联系。据陈铭枢回忆，他先后见过的中共领导人有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潘汉年等。从1937年11月到1938年3月的5个月中，他与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会见15次，不可谓不多。而且他们不仅仅是礼节性会见，见面时总要互相通报情况，讨论抗战前途。陈铭枢从二度旅欧时与中共建立的关系，此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也为他以后投身于反蒋民主运动，与中共建立密切的合作打下了基础。

陈铭枢在武汉同文化界的朋友过从甚密，一度同郭沫若、田汉一起住在新四军筹备处。有一次，郭沫若在病中，陈铭枢去看他，谈起自己是著名佛学家桂百炼的弟子，请郭做一联，将自己的字“真如”嵌进去。郭沫若即书联一幅：“真理唯马克思主义，如来是桂百炼先生。”

在抗战初期，陈铭枢还写了一些文章，宣传团结抗战。1937年底，陈铭枢发表了一篇专论《巩固统一抗战到底》。在这篇文章中，他开宗明义即提出：“我们要一直抗战到底，始能争取民族生存；我们要努力巩固统一，始能抗战到底。”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陈铭枢认为不能依赖抽象的空谈，而要以抗战国策为基础，从大处远处着眼，作有效的解决。他提出几项具体建议：1、关于政治机构。“为了抗战的需要，对于既成的政治体制，当然

要设法求其充实与调整，然而这种充实与调整的施行，都应以便利抗战活动的推进为原则。不顾战时急需的门户成见，利用战时机会的攘窃企图，同样有碍政治机构的调整。”2、关于外交问题。“因为统一不够巩固，意志不够融合，以致在外交步骤上难免不显出一些不够明确的表现，与模糊不清的观念。”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一是确定谁是我们真正的友人或与国，二是对日绝交与撤回大使。3、关于民众运动。“抗战几个月中所感到的最大缺陷，就是我们没有利用我们在人口上对于敌人的优越，我们没有把民众力量与军事力量配合起来。”原因“依旧是由于团结的意志不够融合，统一不够巩固，以致在民众运动的发动上，引起了许多不必要的顾忌和不应有的妨碍”，“应立即下大决心，破除地盘主义，破除不切实际的形式主义，破除高调的口号，在全国民众动员的总纲领之下，造成真正全民抗战的局面”。可以看出，陈铭枢这些建议，有的就是他多次向蒋介石进言的内容，有的是他根据自己的观察思考得出的结论，体现了他关心抗战前途的拳拳之心。

在这篇文章中，陈铭枢还表示了拥护蒋介石的态度。他写道：“既往不咎，来者可追。在这危亡紧迫关头，我们全国朝野上下人士，应急痛自警惕，在抗战到底的大目标下，巩固统一，而专诚拥护领袖，排除个人小我利害打算与意气争执，则为巩固统一的基本条件。以目前情势而论，对于抗战最高领袖蒋委员长的拥戴，已为举国朝野人士一致倾向和坚守不渝的信念。但在朝野人士间，在旧来诸党派关系间，仍无可讳言的留残下了一些不必要而且有乖抗战大目的的疑忌与磨擦。多一分疑忌磨擦，则减一分抗战力量。我希望全国智能有为之士，不要在这些方面浪费了个人精力，贻误了民族前途。我个人始终在以此自励自勉，始终在企图化除朝野间各党派间的隔阂，而造成全国一致挽救危亡复兴民族的共信。”这些看法可能会引起一些非议，但是反映了陈铭枢当时调停党派矛盾，尤其是国共矛盾的真实想法。他认为抗战既已开始，就应捐弃前嫌，全民一致，为赶走日本侵略者而努力。他主张解散民族革命同盟，主张拥护蒋介石，都是基于这样的想法。他当时对蒋介石还寄予希望，因而过于乐观，过于轻信，而不明白以斗争求团结的道理，不太明白争取民主对坚持长期抗战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事实会教育他，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我们也不必多所苛责。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陈铭枢呼吁：“从大处远处予以考量，而求得国策的明决确定与一致支持，那就是从实际的状态中巩固统一，同时也就是以最有效的方法，最大公无私的态度，来推进民族战争。总之，当前抗战到底的先决条件，是尽可能的多方的设法巩固统一。”^[15]陈铭枢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是呼吁全民统一、一致抗战。显然，一个分裂的、不团结的中国，是不能支持抗战到底的。中国抗战的胜利，就是全民族团结的成果。从这个意义而言，陈铭枢的文章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尤其是他主张改组体制，明确外交路线，发动民众，都是切合坚持抗战、坚持进步的国家、民族利益的。这是他能够成为民主阵线的一员的本质所在。

1938年12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逃离重庆，投靠日本，成为国人所不齿的汉奸头

目。陈铭枢曾是汪精卫的老友，有过合作共事的历史，他对汪精卫的卖国投敌极为愤怒。1939年10月22日，陈铭枢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作了题为《汪精卫的解剖》的演讲。在演讲中，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从历史到现实，揭露了汪精卫朝三暮四、毫无原则、只图私利的无耻行径。他毫不留情地指斥汪精卫“是一个以冲动埋没了理智，以媚顺遮掩了野心，以浮文粉饰着恶行，以虚声哄骗着大众的人”，“试看自有民国以来他所说过的话，所行过的事，有哪一句哪一件兑现过。他交手过的文武官长及朋友，有哪一个不上过他的大当。”^[16]在整个抗战期间，陈铭枢都在尽力做着宣传抗战、鼓动民众的工作。虽然由于蒋介石对他的疑忌，以及内外环境所限，大大压抑了他在这方面的积极性，但他所做的工作是后人不应忘记的。

四、隐居山野

陈铭枢自抗战爆发后回国，大多从事的是民间工作。虽然他并不看轻这些工作，但作为一名抗日将领，他更渴望能够跃马疆场，或纵横政坛，为抗战作更大的贡献。但是，蒋介石对他防范甚严，害怕他一旦有了权力，又会成为自己的对手，因此蒋虽对他解散同盟组织、拥护自己的态度表示满意，但始终没有给他一个实际职务。他对蒋的多次坦诚进言，可能更加重了蒋的不满和戒心。蒋、陈自1938年6月之后已很少见面，陈一度对蒋抱有的希望，也因蒋的固执成见、拒不改革而化为无形。当年叱咤风云，而今报国有心，请缨无路，他只能常以饮酒、赋诗、练书法来打发时光，内心的苦闷、失落是可以想见的。据陈公博回忆：“在汉口差不多每日和真如见面，他也不谈军事，也不谈政治，只埋首学做诗，发发牢骚，寄寄清兴。”^[17]据陈铭枢回忆，他与蒋介石6月5日在武昌东湖相见，不欢而散之后，“多日饮酒，赋诗亦多苍凉”。^[18]兹录二首如下：

无题

万事归平淡，轮囷结此身，
难将寂寞意，解向热中人。
日暖群喧动，时危一剑亲，
谁欤引明烛，共照万家春。

东湖放吟

8月14日偕任潮、德邻诸公东湖游泳小宴水滨被酒放吟一绝

被酒披襟意气豪，无穷忧愤感蓬蒿。
秋风吹涌湖光泪，千古英雄付浪淘。^[19]

国家和敌人血战，民族处在危亡的关头，正是军人报国之时（时危一剑亲），而自己却困顿在此。战争是空前的激烈，在这里却化为平淡无奇。谁能够指引一条光明大道，使国家民族走上胜利的道路？自己一身的豪气，只能在酒后发泄，英雄落魄，引发出无穷的忧愤，对着秋风吹皱的湖光，不免落泪满襟，感到自己好象是被时代淘汰的英雄。“归

去来兮”，但他无家可归，只能别寻遁身之地。1938年5月，陈铭枢入川游历时到了重庆北碚名胜缙云山，发觉此处远离闹市，风景优美，且气候宜人，可避重庆夏日之酷暑，便动了在此居住之念。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恶化后，8月即入川长住，重庆市内有一居处，又在缙云山建一茅庐，无事不进城，就在山内隐居。缙云山是中国佛学会会长、著名佛教主持太虚法师创建的世界佛学苑所在地，高僧云集，名流荟萃。陈铭枢一直醉心于佛学，激起了他真正用心钻研佛理的兴趣，能在这里与太虚法师及诸高僧时相过从，研讨佛理，吟诗做对，饱览山水，倒也清闲自在，从而多少冲淡了他的抑郁不快之感。他在这里留下了不少诗词、书法作品，吟山咏水，格调幽深、清静。现录数首如下：

题古常道观

仙鹤空传降碧霄，几人蕉梦尚迢迢；
九州半化修罗土，龙虎山上漫矫矢。

经朝阳洞怆然有感

朝阳几度出东门，今向重峦挹翠云；
陵寝惊收匡复泪，洞天亦自稳春魂。^[20]

七律

松涛豹雾中，偶阅高僧诗卷，多有滞于闲静景色为自得者，用咏一律：

万物齐观孰究穷，阴晴隐现意融融；
疑林似海风声变，吐夕吞晨雾色蒙。
缘着寂喧皆是幻，心无染净本来同；
闲尝笑讽诗僧卷，对竹寻泉总说空。^[21]

陈铭枢在表面的清闲之下，仍然深藏着对抗战前途与国事的无比忧虑，他的忧愤之情也不时通过诗作表现出来。以下是他的几首感愤之作：

登青城第一峰

虎踞龙蟠毒雾封，迢迢寄恨上高峰。
蜀中子弟新仍境，东下貔貅怒发冲。

广州陷后两日感赋

夜深听雨，久不成寐，幽思潮涌，挥长句寄恨。
大梦劳生一隙尘，醒来已负戴天身，
虚窗响忆深山宿，华发催将逝水沦。
无碍风怀归净寂，不磨名节属艰屯，
天南又告金瓯缺，惊魂西游一散人。^[22]

1942年，郭沫若编写的历史剧《屈原》在重庆上演，轰动山城。剧中主人公屈原忧国

忧民、忠而被谤的情节，引发了陈铭枢的共鸣，观后即赋诗道：

一

词高心苦激人天，太息萧茅绳蕙荃。
千古文章推屈宋，岂知正气属蝉娟。

二

行吟负手欲呵天，又睹悲歌正则传。
唤起怀沙千古愤，眼中泪水尚当年。^[23]

陈铭枢隐居山中数年，似乎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了。他当年的友好都有了实际职务，分散于各地。李济深先后任军委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桂林办公厅主任、军事参议院议长；蒋光鼐先后任第四战区参谋长、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衢州绥署主任；蔡廷锴先后任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粤桂边区总司令。虽然都是些没有多少实权，也没有多少事做的虚名闲职，但毕竟保持着相当的社会地位。他们来重庆时，总要与陈铭枢相见，为陈铭枢的境遇愤愤不平。蔡廷锴在一次看望陈后说：“吾人回忆昔年为党国奋斗，虽不敢言有何功勋，陈先生领导吾人出生入死，以良心而论，当有相当劳绩。以退一步而言，吾人在闽固不满当局而起革命，亦为国家民族。只有公敌而无私仇。试问现在京中要人亦有前与当局采取对立者，现在彼此均为抗战而团结入京，赞助中枢，何以对彼等则厚，对陈先生则薄，未免过于狭隘偏袒。”^[24]这当然是对蒋介石压制陈铭枢的批评。陈铭枢与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之间仍一如既往，保持着密切往来。有一次，李济深来看望他，临走前，陈铭枢赋诗一首道：

赠别李任公

小楼惘疑吐离忧，翻覆乾坤迄未休，
淅沥又惊秋解箨，团圞莫负月当头。
清樽自要佳人共，雅唱难堪俗物酬，
无那孤怀呈绮语，素心认取大江流。^[25]

陈铭枢曾在重庆住所门前书一联：

天下干戈舞，
江边风月长。

此联表达了他对自己在抗日战争激烈进行之际，不能亲上疆场，却只能闲居家中研究佛学的愤懑情绪。但他只能自嘲自解，有诗道：

自笑

东隅已失补茸忙，堪笑孜孜把卷狂，
日入更辉红烛影，月沉自有夜珠光。

片言未稳寻思永，竟夜忘眠意与长，
悟彻原知无一物，自家造苦自家尝。^[26]

但岁月的流逝，并没有消磨陈铭枢的意志，他又找到了发挥自己作用的阵地，即投身于民主政治运动之中。

注释

[1] 漱菡：《赤心巨笔一书生》，《中华杂志》（台北），第25卷第1期。

[2][4][8][9][10][11][12][18] 陈铭枢未刊回忆录稿。

[3][24] 《蔡廷锴自传》第453页；568-569页。

[5] 《梅龚彬回忆录》第95页。

[6] 张威：《我所知道的李济深》，《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

[7] 张军民：《中国民主党派史》第232页。

[13] 汉口《大公报》1938年2月12日。

[14] 《新华日报》1938年7月24日。

[15][16][20][2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稿。

[17] 陈公博：《苦笑录》第310页。

[19][21][25][26] 《陈铭枢纪念文集》，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169-170页；173页；175页；172页。

[23] 据李家友先生提供稿。